

ZHONGHUAMINGGUOSHIGONGSHU



中华民国史丛书

辛亥革命后，地方势力抬头，我国西南几省军阀逐渐演变成实力雄厚，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实力派。对他们，蒋介石时而剑拔弩张、能吃则吃，时而又无可奈何、听其自然，时拉时打、时哄时骗，关系十分微妙。其过程曲折离奇，其内容惊险有趣。书中作者的一些新观点，颇能使人耳目一新。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

谢本书 牛鸿宾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hua mingguoshicongshu



中 华 民 国 史 丛 书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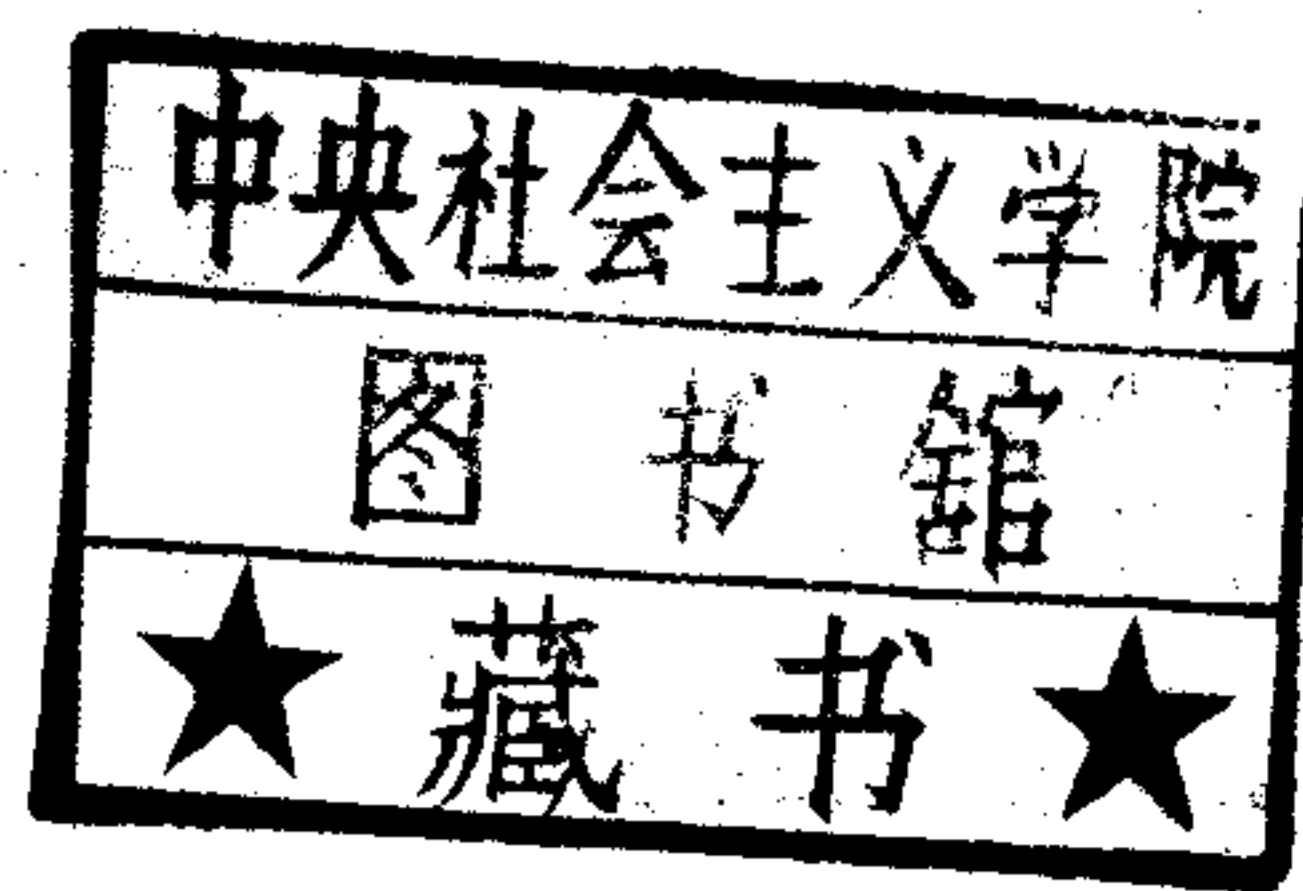
李 新 孙思白 陈旭麓
胡 华 彭 明

主 编：

张宪文 黄美真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学庄 方庆秋 毛 磊
史全生 李静之 杨凤阁
金普森 段云章 张文惠
张宪文 郭绪印 徐辉琪
黄美真 蒋湘炎 靳德行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

谢本书 牛鸿宾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

谢本书 牛鸿宾

责任编辑 张 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272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12,295—19,126册

ISBN7—215—00705—7/Z·29

定价,6.50元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研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

2503/14

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绪 论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地方实力派始终是一个使他头痛的问题，对之既要笼络和收买，又要排斥和消灭。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矛盾中演进的。地方实力派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及其与蒋介石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是民国史上惊心动魄的奇观。无论从什么角度讲，这一幅幅生动、奇特而又多变的画面，始终扣击着人们的心弦。

这本书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角度，来阐述其形成、发展和变化及其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将是颇为有趣而有益的。

一

何谓“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的时候，明确地指出：“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①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9页。

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① 这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地方实力派，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是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是革命力量联合的对象。

“地方实力派”作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其特点是一要有地盘，二要有实力。如果要用几句话给予定义的话，那么可以作如下的表述：地方实力派是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控制着一定地盘，掌握着可观的军队，具有相当的实力，而又不属于蒋介石中央嫡系的地方军事（或军政）领袖们及其派别。

地方实力派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而其后来的变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引人注目的角色。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中间势力，他们既与进步势力、也与顽固势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旧阵营的时候，他们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乃是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又影响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研究地方实力派以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之关系，这是近代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其意义是应当加以肯定的。第一，有助于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② 地

① 《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803页。

方实力派的历史及其与蒋介石之关系，与近代政治史、军事史密切，也与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相关，对它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扩展。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在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在国共两党之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近代史、近代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二，有助于开辟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统一战线史研究的新领域。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的演变，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影响着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而作为中间势力的地方实力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后倾向，对国共两党关系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自身的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对于我国民主革命来说，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资产阶级及其有关的中间势力的问题。因此，努力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研究中间势力的演化就成了统一战线史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对作为中间势力的地方实力派的研究，将有助填补国共关系史、中共统一战线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三，有助于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开展。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民族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因此要深化历史的研究，只停留在“中国通史”的研究上，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的，开展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势在必行。加上，各地区在自己的战略发展研究中，需要借助地区历史发展的情况与资料，地区史、地方史的研究刻不容缓。研究地方实力派的演化，是开展区域史、地方史研究中不可缺少

的，这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研究地方实力派，传播历史知识，打破某些奇谈怪论，对群众进行普及客观历史知识的教育，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值得注意的。近代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相当一部分人都有自己一部“传奇的经历”，在不同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对他们赋予了不少“神秘的色彩”。而这些传奇的、神秘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历史的知识性、趣味性的产物，有的则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伪造，以至于充斥着迷信的、荒诞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民间传说中，还有相当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正确地科学地阐明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对于澄清历史事实及其真象，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普及历史科学知识的教育，都是有好处的。

由于地方实力派及其与蒋介石关系历史的特殊趣味性，这些历史研究的成果，有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也可能成为达官贵人柜窗里的“高级装饰品”。不过这恰巧说明，这类历史研究的引人入胜之处。

二

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北方地方实力派，另一部分是南方地方实力派。北方实力派又包括华北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和西北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南方地方实力派就是本书将要叙述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湘、潘文华、邓锡侯，西康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卢汉等）。南、北两方的地方实力派，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不同的表现，而最后的归宿则差异尤大。事实上，各个地方实力派都是不尽相同的，指出他们

的不同点常常比指出他们的共同点来，更为容易。

我们这里简要地谈一下北方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情况。

北方地方实力派对后来影响大者，自然要推华北山西的阎锡山及其所形成的晋系地方派别。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人，出身于封建典当家庭，初入山西武备学堂，后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并为“铁血丈夫团”成员之一。1909年初，阎锡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后回国，1911年已升任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团长）。辛亥太原起义，山西独立，被推为山西都督，从这时起阎锡山即统治山西；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才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的38年统治。

辛亥以后，阎锡山投靠袁世凯，袁世凯死后又投靠段祺瑞，成为统治山西的晋系地方军阀。1927年6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阎锡山自任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涿州，袭击奉军后路；其后又占领了北京、天津，兼任了平津卫戍总司令，成为掌握华北地区军政大权的暴发户。1930年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动员军队超过百万，历时7个月之久，最后阎锡山失败逃回山西，通电下野。一年以后阎锡山又重新控制了山西，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并制订“十年建设计划”，以巩固自己的地盘。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深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阎锡山为了自己的“存在”，表示愿意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于1936年9月建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7年8月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牺盟会和决死队“名义上是当时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领导的团体和部队，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组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和抗日武

装，它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建了光荣的业绩。”^①

“七七”事变以后，阎锡山就任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驻山西、绥远的所有部队，进行抗战”。^②接着山西太原、临汾等地先后沦陷，牺盟会、决死队深入敌后，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不管怎么说，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阎锡山，在抗日战争初期，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进行联合抗日，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有所动摇，并与日方暗中勾结，进行联日反共活动是应该批判的。但他毕竟没有公开投降日本，这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是有区别的。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重返太原，却支持蒋介石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与人民为敌。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太原，阎锡山逃往南京，再逃广州，6月阎锡山就任了在广州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不久大陆全部解放，阎锡山飞往台湾，直到1960年5月死去，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

北方另一个影响较大的实力派是一度控制新疆大权的盛世才。盛世才（1892—1970），字晋庸，辽宁省开源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南京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1930年去新疆，为督署上校参谋，在镇压哈密维族人民武装暴动中立了“功”，先后晋升为少将、中将、东路总指挥。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政变，盛世才玩弄两面手法，自称“新疆边防督办”，1934年又成为督办兼主席，成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盛世才为了争取苏联援助，打起了亲苏、反帝的旗号，提出了反

① 《牺盟会和决死队》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页。

②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23页。

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1936年以后，盛世才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定了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①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盛世才即发表了“披肝沥陈中央”的抗日声明。1937年5月，盛世才与中共达成协议，将退居在星星峡的400名红军指战员接到乌鲁木齐；1938年在乌鲁木齐成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后来，他曾致函斯大林，说自己是“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者”；还说：“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反帝会员都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然而，话音未落，盛世才却大批逮捕、杀害中共党员和各族进步人士，于1942年7月3日上书蒋介石，表示归诚。通过盛世才关押、杀害的人，“有说五、六万的，也有说十万的，大概很难说出个准确的数字来。”^②1943年，盛世才又兼任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这个走狗被蒋介石调离新疆，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长（后去台湾），另派吴忠信主政新疆。新疆直接纳入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1949年新疆和平起义，乃是中共的争取和解放战争胜利进展这个大势所趋的结果。

北方实力派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等所谓西北“马家军”，这里我们以马步芳为代表加以说明。马步芳（1903—1975），字子音，籍隶甘肃河州，出身官宦家庭。其父马麒以巴燕戎格厅扎巴镇和循化作根据地，奠定了马氏家族统治青海43年之久的基础。马步芳年12岁时，即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少校参谋，此后扶摇直上，历任营、团、旅、师、军长

①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245页。

② 《新疆五十年》第269页。

和集团军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等职。马步芳独挡青海政局达18年之久。马步芳在抗日战争时期，虽无多少建树，也未投降日本。在抗日战争紧张时刻，蒋介石曾两次计划以西北为最后据点，马步芳自然成为一个依托点。所以，蒋介石曾称誉马步芳的部队为“岳家军”，鼓励其精忠报国，以岳飞期许。^①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马步芳一头扎进蒋介石的怀抱，参与反共内战。1949年8月，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匆匆逃往重庆。蒋介石眼见马步芳已失其使用价值，乃以“擅离职守”为名，给予撤职议处处分。随后，马步芳逃亡国外，于1975年病死于沙特阿拉伯。

从以阎锡山、盛世才、马步芳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的叙述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基本的特点。尽管他们的出身并不完全相同（有同盟会出身，也有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然而都有过相当实力，控制着一定地盘，经历过一段军阀生涯。而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刻，在不同程度上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有过反帝抗日的表现（尽管还存在某些问题，但终究未投降日本），这是北方地方实力派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随后的时期，他们却又先后投向了蒋介石集团，了结自己反共反人民的一生。北方实力派的归宿与南方实力派的主要人物是分道扬镳的（当然亦有少数人例外，如马鸿宾）。

顺便说一句，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北军，事实上也有地方实力派的特征。不过他们的发展情况与本书所要谈的地方实力派有所不同，当另为论述。

^①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修订版第52页。

三

再谈南方地方实力派，也即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南地方实力派是指在中国的南方或西南方，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未沦陷或未完全沦陷地区的实力派，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和广东等省区。这六个省区与历史上“西南军阀”的势力范围相吻合，事实上西南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西南军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认为，西南军阀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前身。

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在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南方省区，逐渐形成了分成许多派系的地方军阀。这些军阀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而所属省区又基本上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因而历史上称为西南军阀。

西南军阀在民国初年，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这样又使这六个省区大体上分为两类地区，滇系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陆荣廷控制了广东、广西两省，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

尽管西南军阀并非一个完整的独立集团，它们内部派系林立，既无“团体”之称，又无统一机关可言，有的只是川系、滇系、桂系、黔系、湘系、粤系等名目，而没有自称为“西南系”的。不过，应当承认，在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下，西南各省军阀与北洋军阀在对待若干重大政治问题上虽有共同点，更多的则是不相同的，因而人们把它们看作是区别于北洋军阀的另一军阀集团，不仅是理解的，而且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以滇、桂系为代表的西南军阀，其酝酿和形成的背景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不过，从辛亥革命起，经过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滇、桂系都不能看作是独立的地方军阀集团。只是在1916年反袁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以滇、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才得以逐渐形成。

直到1927年以前，滇系唐继尧一直相当活跃，不仅自称“东大陆主人”，还曾有五省、八省联军总司令的头衔，号称“联帅”。1927年被其手下四镇守使赶下台，不久死去，以唐继尧为首的旧滇系退出舞台。接着，龙云掌握了云南省政，统治云南达18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龙云力主抗战，支持民主运动，并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民盟。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龙云为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而离开云南。卢汉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后，继续控制地方实力，并于1949年12月宣布云南和平起义，归向人民。

桂系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以后，控制两广，曾任两广巡阅使。1920年以后旧桂系开始走下坡路，1925年残部亦被消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了广西。随后，新桂系与蒋介石发生多次冲突，抗日战争中，李宗仁、白崇禧都率部在抗战前线。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李宗仁等在国民党中央政权中占据要津，一度为副总统、代总统，大陆解放时逃走。十余年后，李宗仁又重返祖国，受到欢迎。

至于川、黔、湘、粤诸系情况比滇、桂系更为复杂，然而最后属于湘系的程潜、粤系的李济深，川系（包括后来之西康）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都先后归向人民，走上了光明的大道。

西南地方实力派与北方地方实力派相比较，有共同的特点，主要就是地方、实力这两点，而更多的则是具有不同的特点。其

差异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实力派头面人物的出身不同，早期的历史地位不一。南方实力派人士在早期大多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少人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起义，在头上有革命的光环。而北方实力派则不然，其早年的革命历史很有限（如阎锡山），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军阀行伍出身（如马步芳），并无什么革命历史可言。

第二，虽然都参与了抗战，但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相差甚远。南方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比较坚决，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比较认真，对抗战贡献较大，而且支持民主运动，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在抗战后期还秘密加入了民盟。北方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大多虎头蛇尾，而且有的还与日寇秘密勾结，暗中签订协定；或者与顽固派相勾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第三，最后的归宿，差距尤大。南方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虽经历仍然比较曲折，但最后大多归向了人民，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北方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基本上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以军阀、反革命了结一生。

南北双方地方实力派最终的不同表现，有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深刻原因，南北双方不同的地理位置也是原因之一。自近代以来，中国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可低估。从南方来讲，由于生产较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较早，因而也是比较开放的地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亦较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南方为基地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南方也有相当的基础。这些因素不能不给南方地方实力派以深刻的影响。而北方则不然，总

的讲北方生产水平落后于南方，除了京、津地区以外，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微弱，封建的封闭的经济及其思想都比较顽固，民主革命的开展落后于南方，这些因素也不能不给北方地方实力派以影响。这种状况，是造成南北地方实力派不同特点和不同归宿的重要原因。

四

从民国初年的西南军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地方实力派，是中国西南地区现代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两者既有诸多的联系，也有原则的区别。

两者的联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头面人物，是由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演化而来，或是一脉相承的。第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军事实力（军队），是继承西南军阀的军事实力而来，有的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发展，有的则没有明显的变化。第三，西南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阀所在的地域范围，也大体一致或接近。正是从这种联系出发，我们认为，西南军阀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前身；西南地方实力派是从西南军阀演化而来的。

两者的区别集中到一点，是代表的阶级、阶层的不完全一致，以及反映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西南军阀基本上代表西南地区封建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在政治上与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相抗衡，反共反人民；只是由于他们与控制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势力有矛盾，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斗争；然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又常常背叛孙中山的势力。